

晚明詩話中的詩經學初探

郭正宜*

摘要

本文擬就晚明時期的詩話著作做一探討，以胡應麟《詩藪》、陳第《讀詩拙言》、郝敬《讀詩》、《藝圃僉談》、許學夷《詩源辯體》、鄧雲霄《冷邸小言》、謝肇淛《小草齋詩話》、馮復京《說詩補遺》、費經虞《雅倫》、方以智《通雅詩話》等為底本。明代從萬曆以後的七十年期間，隨著《詩經》研究的勃興，詩話中關於《詩經》的討論也有所增多，頗值得一探究竟。但詩話著作對於《詩經》的態度並不同於經學家的態度，也不盡然等同於講章、評點各派，他們不是為士子科考揣摩經義作八股，也不是為了承擔傳道解經的責任，他們擺脫功利的目的，純粹把《詩經》當作文學經典來解讀。換言之，詩話中《詩經》的見解，往往是對《詩經》的文學見解。雖說詩話著作往往片言隻字，缺乏系統的解讀，但能對這部文學經典提出深造有自得的文學見解，如《詩經》在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意義、風格、以及對「賦比興」不同的見解等問題，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明代的《詩經》學提出了必要的補充。根據筆者考察晚明的詩話著作，歸納綜合之後，探討的方向大抵有六，並分為六個節次來討論：一為注重《詩經》文學史的地位；二為注重情性；三為尊序與廢序；四為對「賦比興」不同的見解；五為朱熹讀詩法的繼承；六為注意古音古韻的問題。

關鍵詞：明代、詩話、詩經、經學、賦比興

*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暨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Shijing Study of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Kuo Cheng-I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o Yuan University,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 for Doctor's Degr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Shijing Study (詩經學) of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詩話)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晚明) The text which is discussed on contains Hu Ying Lin, *Shi-Sou*, (胡應麟, 《詩藪》) Cheng Ti, *Du-Shi-Zhao-Yan*, (陳第, 《讀詩拙言》) Hao Ching, *Du-Shi, Yi-Pu-Cang-Tan*, (郝敬, 《讀詩》、《藝圃僉談》) Xu Xue Yi, *Shi-Yuan-Bian-Ti*, (許學夷, 《詩源辯體》) Deng Yun Xiao, *Leng-Di-Xiao-Yan*, (鄧雲霄, 《冷邸小言》) Xie Zhao Zhi, *Xiao-Cao-Zhai-Shi-Hua*, (謝肇淛, 《小草齋詩話》) Feng Fu Jing, *Shou-Shi-Bu-Yi*, (馮復京, 《說詩補遺》) Fei Jing Yu, *Ya-Lun*, (費經虞, 《雅倫》) Fang Yi Zhi, *Tong-Ya-Shi-Hua*. (方以智, 《通雅詩話》) While the Shijing Study raised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re was much worthy discussion increasingly on it in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The attitudes of the authors writing down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onfucian,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of the annotation. They wrote down those commentaries on poetry purely for the literary interests rather than for interpreting the Confucian canon, as well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another word, the discourse on Shijing in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is the literary comprehension. Although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provided the unsystematic opinion, it did the different comprehension on Shijing. Those comprehension was not only the status, meaning and style of Shij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difference on Fu, Bi, Xing. (賦比興) Meanwhile those commentary was well supplied with difference on Shijing Study in their ways and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 on this academic area. In my conclusion, there would be six dimensions to probe into this topic. First of all, they emphasized the Shijing'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Secondly, they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position in Shijing. Thirdly, they discussed the question whether we should venerate Shijing Xu (詩序) or not. Fourthly, there was different comprehension on Fu, Bi, Xing. Fifthly, they also discussed the problem whether we would inherit the Zhu Xi's (朱熹) way of reading Shijing. Finally, they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honology in Shijing.

Keywords: Ming Dynasty, the Commentary on Poetry, Shijing, Fu, Bi, Xing, Confusian

晚明詩話中的詩經學初探¹

郭正宜

一、前言

明代學術空疏，幾已成歷史定論。造成有明一代空疏的學風，論點大約可歸納為兩點；一為胡廣、楊榮、金幼孜、葉時中等三十九人奉命集諸家傳注而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等，倉促成書，率抵據元人舊書抄襲相蒙而成。²有明一代學術空泛之風，從明朝初年基本確定下來；二為明人科舉考試之《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既已如此空疏鄙陋，再加上考試之法以八股文取士，更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為害尤烈。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對此有一段評語：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

¹ 對於本文兩位匿名評審教授不吝提供論文修改意見，筆者謹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² 明初所編大全為：《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書傳大全》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禮記大全》三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周易大全》主要承襲元朝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董真卿之《周易會通》、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及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刊除其重複而勒為成書。《書傳大全》以蔡沈《書集傳》為主。《詩經大全》以元人劉瑾所著《詩傳通釋》為本而稍加損益，小變其例而已。《禮記大全》以元朝陳澹之《禮記集說》為宗。《春秋大全》以元朝汪克寬之《春秋纂疏》稍為點纂而成。《四書大全》因襲元朝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纂而成，只是稍有增刪，其詳其簡，反而不如倪氏，甚而還有舛誤。《性理大全》，胡廣等采宋儒之說一百二十家而成。詳情可參閱吳雁南、秦學頌、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頁434-436。

實自此始。³

顧炎武大概以為明初所編大全率沿襲元人經說的影響，進一步直斥明人著書皆為竊書：

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也。⁴

而這錯誤印象，影響到張廷玉及皮錫瑞等人。如張廷玉《明史·儒林傳》說：

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⁵

這段話直指有明一代無人以經學名家，在經學上，比不上漢、唐人之專精；在性理上，徒襲宋、元人之糟粕。換言之，直接指明了明人學術空泛之風。皮錫瑞的《經學歷史》更直接指出：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⁶

但對明代學術持肯定態度，有清末的劉師培與章太炎。如劉師培說：

近儒之學，多賴明儒植其基，若轉斥明學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⁷

章太炎說：

儀徵錙光漢（即劉師培），贈余《字詁》、《義符》，明黃生作也。其言精瑣，或出近世諸師之上。夫偽《古文》之符證，發于梅鷟；周、秦古音之例，造端於陳第。惟小學，亦自黃氏發之，孰謂明無人乎？顧獨唱而寡和耳。⁸

姑不論有明一代學術是否空疏與否？從清朝以來，研究中國經學歷史的學者，承襲顧炎武的錯誤印象，對明代《詩經》的研究成果，往往僅用聊備一格式的數言帶過，而且否定者多，肯定者少。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僅用「季本、郝敬多憑臆說」、

³ 參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冊三，卷十八，頁11。

⁴ 參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冊三，卷十八，頁31。

⁵ 參見《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清乾隆武英殿影本）冊四，卷二八二，頁3096。

⁶ 皮錫瑞著，《經學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2月臺四版），頁56。

⁷ 參見劉師培著，《劉申叔遺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2刷），上冊，頁502。

⁸ 參見章太炎著，《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1月1版），卷一，頁82。

「豐坊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以行世而世莫能辨」二語，將明朝的《詩經》研究一概否定。另胡樸安的《詩經學》一書，論及明代《詩經》的研究，僅舉《詩經大全》、《詩解頤》、《讀詩私記》、《詩經世本古義》、《詩故》等五部書。其結論是：「明人之學，在義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證一方面言，不及漢唐之密。」夏傳才的《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基本上認為明代學術的空疏，以為明初說詩，本之抄襲而來的《詩經大全》，內容仍都是對朱熹《詩集傳》的疏釋，尊崇朱熹，全無創見。在明代前期，沒有一本值得一提的《詩經》研究著述。對明代中期的看法，則著重在豐坊《子貢詩傳》及《申培詩說》兩本偽書上及其影響，他認為這兩本書托名古人，突破漢、宋以來傳統詩說，表現出對《詩經》重新研究的要求，它對有些詩篇的具體見解，在明人的《詩經》研究史上，不失為一家之言。到了明代後期，相繼出現不再專崇朱熹，開始兼采諸說的著作。或錄朱傳、或錄毛詩序說，如姚舜牧《詩經疑問》、張次仲《待軒詩記》、賀貽孺《詩觸》。有的著述乾脆非難朱說，而信從毛詩，如李先芳《讀詩私記》、朱謀瑋《詩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郝敬《毛詩解》和《毛詩序說》。夏傳才認為這些著述，並沒有創造性見解，並沒有超出《毛詩序》和朱傳的成就，在學術研究上沒有太重要的價值。夏氏認為明代對《詩經》研究作出突出貢獻有二：一為對於《詩經》的名物疏釋，作了一些校正和補遺，如馮應京《六家詩名物疏》、毛晉《毛詩陸疏廣要》、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等；二為創闢了《詩經》音韻學的研究，如陳第《毛詩古音考》。⁹另林葉連的《中國歷代詩經學》，更舉真偽不分的《詩傳嫡冢》、《詩傳闡》、姚允恭《傳說合參》三著，以此看來明代《詩經》學之學者不過數位，著作不過數部，而且真偽不辨，無甚精義，多憑臆說。據上所言，似有明一代之《詩經》學不值得研究一般，但謹就有明一代詩經研究書目，據劉毓慶查閱數十種書目著作及地方志，共得 600 餘種¹⁰，可謂盛以漪矣！由此可見，明代《詩經》學仍有廣大的開拓空間。

臺灣學界對明代《詩經》學的研究，實由林慶彰所帶動，除了早期論證《申培

⁹ 參見夏傳才著，《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1993年7月初版），頁188-197。

¹⁰ 參見劉毓慶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1版1刷），〈附一：明代《詩經》著述考目〉，頁440-459。

詩說》乃王文祿所偽作的創見外，並探討朱謀瑋恢復漢學，肯定《詩序》的努力；及楊慎重漢學之詩經學研究；又與賈順先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收錄有關楊慎詩經學研究之文；更翻譯日本學者村山吉廣探討鍾惺與郝敬詩經學研究的論文。通論一代的有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打破傳統僅注重在詮釋上有創見者的討論方式，首創從傳播學的角度論證明代詩經學流衍發展的研究方法，進而指出漢學在明代發展的事實；又論析梁寅《詩演義》與朱子《詩集傳》不同之觀點、論證《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異同與傳承關係，以見元明兩代詩經學發展的關聯性，並糾正顧炎武以來《大全》全剿《通釋》的誤說。也探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用《化書》之意義。陳恆嵩亦論及《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關係。劉人鵬與竺家寧均有分析陳第《毛詩古音考》成就與貢獻之文。蔣秋華探討郝敬、顧夢麟、陳子龍等在詩經學上的成就。陳文采討論鍾惺批點《詩經》之內容與價值。¹¹另劉毓慶的《從經學到文學》一書則是關注整個《詩經》學史的發展，突顯明代詩經學的價值、意義與地位，及《詩經》研究從經學向文學的轉變，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明代《詩經》文學研究的成果之上。劉氏認為明人《詩經》經學研究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一是在考據訓詁上，一是在詩旨的探討上。¹²但劉氏又進一步認為：明代《詩經》學最突出的貢獻還不在此（指詩旨的探討），而是在於這個時代第一次¹³用藝術心態面對這部聖人的經典，把它納入了文學研究的範疇。¹⁴尤其是明萬曆以後的七十年是《詩經》文學研究的繁榮與高峰期。這不僅表現在大量《詩經》文學研究專著與大批《詩》學名家的產生上，而且還表現在各種不同流派的出現。就形式而言，劉氏大約區分為五大流派。一為講意派；二為評點派；三為評析派；四為匯

11 此段參閱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一九四九～一九九八〉（《漢學研究通訊》，總79期，2001年8月）一文，頁43。

12 參見劉毓慶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3。

13 此為劉毓慶之意見，其說恐失據，匿名評審教授言：「詩經的文學藝術研究非自明代開始，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竹書《上博簡·孔子詩論》已見端倪；即使以道德政治歷史教化為主軸的毛詩學，亦非全無文學研究的元素；魏晉南北朝的詩經闡釋與接受，如《文心雕龍》及《世說新語》中，已多有文學及審美的元素；朱熹的里巷歌謠說及淫詩說，也有文學元素。以上這些不能全然不顧，吾人或可說，詩經的文學研究在明代大盛，而不能說詩經的文學研究明代才開始。」筆者完全認同評審教授之言，謹此申謝評審教授之提點。

14 參見劉毓慶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5。

輯派；五為詩話派。¹⁵這五大流派，劉氏在其所著之書中已略為提及¹⁶。但詩話著作對於《詩經》的態度並不同於經學家的態度，不盡然等同於講章、評點各派，他們不是為士子科考揣摩經義作八股，也不是為了承擔傳道解經的責任，他們擺脫功利的目的，純粹把《詩經》當作文學經典來解讀。

承上所言，顧亭林批判明代學術的荒疏，謹就經學中的官學而言¹⁷，但民間的學術則蓬勃發展，與官學成為強烈的對比，尤其是明代在野的詩經學更是代有其人，大放異彩。而明代的詩經學，除了劉氏提及外，學界尚未關注到詩話中的《詩經》學。而晚明萬曆以後的七十年，約有五、六十種詩話，劉氏只約略提了胡應麟、郝敬、許學夷、鄧雲霄、謝肇淛、馮復京等數家，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值得開拓。本文謹對晚明時期的詩話著作做一探討，探討的對象有胡應麟（1551-1602）《詩藪》、陳第（1541-1617）《讀詩拙言》、郝敬（1558-1639）《讀詩》、《藝圃僉談》、許學夷（1563-1633）《詩源辨體》、鄧雲霄（1566-1633）《冷邱小言》、謝肇淛（1567-1624）《小草齋詩話》、馮復京（1573-1622）《說詩補遺》、費經虞（1599-1671

¹⁵ 參見劉毓慶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 11-14。

¹⁶ 參見劉毓慶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 361-439。在這五大派中，關於評點派研究關注較多，有日本學者村山吉廣的〈竟陵派の詩經學——鍾惺の評價とし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10 號，1993 年 6 月）、陳文采〈鍾惺《評點詩經》析論〉（《臺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期，1998 年 6 月，頁 15-25）、游適宏〈就「詩」論《詩》：晚明《詩經》評點的興起及其性質〉（《道南文學》第 12 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1993 年 12 月，頁 321-347）、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性質析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 7 期，2002 年 6 月，頁 67-94）等。

¹⁷ 如許學夷就自覺地區分了詩家、經生、聖門對《詩經》不同的態度。詩家相當於對《詩經》的文學看法；經生則相對制義舉業的看法；聖門則指的是傳統經學的看法。如許氏云：楊用修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然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苜蓿、芍藥、芡、芡、夭桃、穠李，何嘗有修身齊家字，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愚按：此論不惟得風人之體，救經生之弊，且足以祛後世以文為詩之惑。（許學夷《詩源辨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80-3181。）又云：趙凡夫云：「讀詩者字字能解，猶然一字未解也。或未必盡解，已能了然矣。」此語妙絕，亦足論禪。今之為經生者，於《國風》搜剔字義，貫串章旨，正所謂字字能解，一定未解也。（許學夷《詩源辨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81。）亦云：風人之詩，詩家與聖門其說稍異。聖門論得失，詩家論體製。至論性情、聲氣，則詩家與聖門同也，若搜剔字義，貫串章旨，不惟與詩家大異，亦與聖門不合矣。（許學夷《詩源辨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81。）

年)《雅倫》、方以智(1611-1671)《通雅詩話》¹⁸等,希企能夠呈現晚明詩話中《詩經》學較完整的面貌,謹就教於大方之家。

二、注重《詩經》的文學地位

胡應麟是晚明時期的著名學者,字元瑞,號石羊生、少室山人,浙江蘭溪人。萬曆四年舉於鄉,其後久試不第,遂築室山中,閉門著書。著作頗多,其中著名的詩話著作爲《詩藪》。對於《詩經》,他主要從文學史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樸;建安諸子,雄贍高華;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途也。兼衰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¹⁹

胡氏在此處說明中國傳統文學是以《詩經》為各個時代文學的總源頭,同時也指出文學代變的文學史觀。胡氏認為傳統文學,上下千年之久遠歷史,雖氣運有所推移,文質之辯迭興,但文學的本質仍根源於《詩經》的。胡氏又論述了〈離騷〉、漢賦、建安諸子、六朝俳偶、唐人律調、古詩歌行等,雖說其體製已異於《詩經》,體式的要求也相同於《詩經》,然其法要仍根源於《詩經》,想要學詩仍要於《詩經》

¹⁸ 本文定義的晚明時期為萬曆至崇禎年間(1573-1644),上述有些作者出生或略早於萬曆,但其成壯年均在萬曆年間,因此歸屬之。

¹⁹ 胡應麟《詩藪》,收於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6月1版1刷),頁2484。

爲宗，無怪乎胡氏言：「兼哀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說明了《詩經》已包括後世文學的寫作法則，詩的精妙法則已具在於《詩經》之中，端看後世之人如何學習《詩經》的寫作法則而已。同時，胡氏又進一步說明《詩經》爲萬世之法，其言曰：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也；〈安世〉，〈雅〉之續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為萬世法。²⁰

綜合以上所言，胡應麟對《詩經》的文學地位，可以歸納爲三點：第一、《詩經》是後世詩歌的源頭；第二、《詩經》不僅是後世詩歌的典範，同時只能爲後世詩歌祖法，而無法超越；第三、各代的詩歌雖各有擅場，但其體格，則隨代而日卑。除了胡應麟對《詩經》在傳統文學史上，有其超絕的地位之外，另郝敬的《藝圃僉談》也認爲《詩經》也具有文學史中的源頭地位，其言曰：

《三百篇》經聖人考訂，其志中正，其氣和平，其詞溫柔敦厚，此之謂雅。秦漢以來，為辭賦，敷演富麗，尚有委蛇忠厚之情，無凌厲排傲之氣。漢魏未遠風雅，六朝靡麗，亦不失溫柔。至唐人四韻近體興，古意遂亡矣。²¹

郝敬認爲《詩經》具有文學史的地位，不是從歷史的生發而言的，主要是從《詩經》的「志中正」、「氣和平」、「詞溫柔敦厚」三者而言，隨著時代演進，此三者亦隨時代演進遞減，遲「至唐人四韻近體興，古意遂亡矣」，說明了文學遞減衰退觀。反過來說，說明了郝敬推崇《詩經》在文學史上的源頭地位。

另外，馮復京《說詩補遺》亦云：

四言，〈國風〉、〈雅〉、〈頌〉，聖籍冠冕。……然後世五七言，句法、字法、興象、風神，鮮不自四詩出者，猶龐鴻之立兩儀，渾泡之導眾派也。

22

馮氏在此處除了說明《詩經》的文學史的源頭地位外，也同於胡應麟的說法，說明

²⁰ 胡應麟《詩藪》，《全明詩話》第三冊，頁 2485。（以下引《全明詩話》者，同此例。）

²¹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77。

²² 馮復京《說詩補遺》，《全明詩話》第五冊，頁 3833。

了《詩經》是後世文學的典範，尤其是近體詩的句法、字法、興象、風神等寫作方式、風格形式的要求，均可追溯到《詩經》。因此，《詩經》可說是後代文學法式與風格的源頭。

此外，許學夷解釋了「三經」與「三緯」：

《三百篇》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風者，王畿列國之詩，美刺風化者也。雅頌者，朝廷宗廟之詩，推原王業，形容盛德者也。故〈風〉則比、興為多，〈雅〉、〈頌〉則賦體為眾。〈風〉則微婉而自然，〈雅〉、〈頌〉則齋莊而嚴密；〈風〉則專發乎性情，而〈雅〉、〈頌〉則兼主乎義理：此詩之源也。²³

此處，許氏解釋了「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說明風是王畿列國之詩，作用是用來美刺風化，其風格是微婉而自然，乃是性情之專發，以比、興為多；雅、頌則是朝廷宗廟之詩，作用是用來形容王者之盛德，風格是齋莊而嚴密，因此以賦體為眾，兼以義理。雖說風與雅、頌，其內容、形式與寫作方式不盡相同。許氏仍將風與雅、頌視為後世詩歌的源頭。

再如，陳第的《讀詩拙言》強調《詩經》為詩之祖，其言曰：

《詩》雖三百篇，然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²⁴

陳第除了強調《詩經》為詩之祖，也是韻之祖：

《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²⁵

但陳第強調《詩經》是韻之祖，除了追溯古音之源的語言學上的要求外，尚有文學意味的韻味之祖的意涵：

夫詩必有韻，詩之致也。《毛詩》之韻，不可一律齊也。蓋觸物以攄思，本情以數辭，從容音節之中。宛轉宮商之外，如清漢浮雲，隨風聚散，蒙山流

²³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178。

²⁴ 陳第《讀詩拙言》，《全明詩話》第三冊，頁2189。

²⁵ 陳第《讀詩拙言》，《全明詩話》第三冊，頁2187。

水，依坎推移，斯其所以妙也。²⁶

以上諸家的說法，在某些觀點不全然正確，但第一、他們確定了《詩經》在文學史的源頭地位，如在寫作的法則、形式、風格、韻味等，《詩經》均是其源頭；第二，他們肯認了《詩經》在後世詩歌的典範地位與價值，成為後代文學，無論其形式、內容、風格，均為效法學習的最佳典範；第三、他們認識到《詩經》對後世詩歌的源遠流長的影響。雖說，他們大抵持著文學遞減的衰退觀，不盡然是合理與符合歷史現象的，但他們能特出《詩經》中的文學面向，從寫作方法、風格、內容等方面來推崇《詩經》，仍是值得肯定的。

三、注重性情

郝敬本身是一位經學家，但除了經學著作，他還有詩話著作，如《讀詩》及《藝圃僉談》兩部著作。其經學著作主要是用經學的眼光來看待《詩經》；但他的詩話著作卻是用文學的視角來看待《詩經》。郝敬的著眼點在於《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及其亙古如新的典範意義。他首先認為《詩經》的典範意義就在其「溫柔敦厚」之上，他說：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繕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也。〈經解〉曰：「詩以道性情，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子云：「詩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興，可以觀。」故學詩即是學道。惟知道者能知詩。……故古之詩人忠信敦厚，今之詩人輕薄陝輸，所關係豈微乎？²⁷

詩本溫柔敦厚。聖人教子學詩：「不學詩，無以言。」蓋心平氣和，金聲而玉振，是為德音。故詩者，性情中和之道，《三百篇》尚矣。漢魏以下，作者概不失此意。舍溫柔敦厚，無別途可走。六朝浸淫俳偶，然猶無方板直突之病。惟唐人近體興，峭厲刻削，狂心傲氣，皆托於詩，與聖人可言之意相

²⁶ 陳第《讀詩拙言》，《全明詩話》第三冊，頁 2188。

²⁷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79。

戾矣。故詩人溫厚之氣，浮曼於六朝，而斲喪於唐。²⁸

聖人教小子學詩、學禮。教其子學二〈南〉，曰：「不學詩，無以言。」溫柔敦厚，所以言也。後之為詩者，凌厲張皇，烏可謂詩！²⁹

言詩多方，總之不離溫柔敦厚。³⁰

總之，郝敬認為《詩經》的「溫柔敦厚」之旨，並不是在於文字表層，而是在於詩人的「忠信敦厚」之上。有了「忠信敦厚」之性，再發而為詩，方有「溫柔敦厚」之風。他又認為後世詩人的「輕浮陝輸」、「張皇凌厲」，是難臻詩之真諦。實際上，他把「溫柔敦厚」當作詩歌的最高標準，也是人格的最高標準。他貶抑後世的詩歌，也正在於後世的詩歌失卻了那股《詩經》古樸的溫厚和平之風。

另如許學夷、鄧雲霄亦有類似之論，許氏云：

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世之習舉業者牽於義理，狃於穿鑿，於風人性情聲氣了不可見，而詩之真趣泯矣。正風如〈關雎〉、〈葛覃〉、〈卷耳〉、〈汝墳〉、〈草蟲〉、〈殷其雷〉、〈小星〉、〈何彼穠矣〉等篇，自不必言；變風如〈柏舟〉、〈綠衣〉、〈燕燕〉、〈擊鼓〉、〈凱風〉、〈谷風〉、〈式微〉、〈旄丘〉、〈泉水〉、〈氓〉、〈竹竿〉、〈伯兮〉、〈君子于役〉、〈葛生〉、〈蒹葭〉、〈九罭〉等篇，亦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學者苟能心氣和平，熟讀涵泳，未有不惻然而感，惕然而動者。於此而終無所得，則是真識迷謬，性靈枯亡，而於後世之詩，亦無從悟入矣。³¹

許學夷認為《詩經》「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但當時之人，競奔場屋，習於舉業時文，學詩不免牽於義理，而狃於穿鑿附會，使《詩經》的風人性情聲氣，蕩然無存，無從體會《詩經》的真趣。許氏認為欲救場屋舉業之風習，唯有「熟讀涵泳」，方能體會出《詩經》是「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

²⁸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81。

²⁹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78。

³⁰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83。

³¹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79。

許氏在此處，標舉了《詩經》中性情，以救後世詩歌之弊端。

鄧雲霄亦云：

《三百篇》溫厚和平，情深語婉，睠顧不忘，終不露一毫聲色。如〈蒹葭〉之懷友也至矣，但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黍離〉之傷主也深矣，但云「悠悠蒼天，彼可人哉」；〈凱風〉之怨嫁母也，尚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偕老〉之刺宣姜也，尚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蘇公之怨暴公也，尚云「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即疾惡如〈巷伯〉，可謂憤矣，亦止云「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而終不忍指斥其名。後世澆薄成風，怨怒慳於詛咒，決絕甚於操戈，一意撒手，誓不回顧。³²

鄧氏在此處引了〈蒹葭〉、〈黍離〉、〈凱風〉、〈偕老〉、〈巷伯〉等《詩經》篇章，說明了《詩經》「溫厚和平，情深語婉，睠顧不忘，終不露一毫聲色」的意旨；同時，鄧氏也對後世「澆薄成風，怨怒慳於詛咒，決絕甚於操戈，一意撒手，誓不回顧」的深惡動絕。鄧氏又說詩是以溫厚和平為主，「稍露幾微，便墮村婦罵偷雞口吻矣。」並引以為戒，其言曰：

余偶讀〈國風〉，至〈猗嗟〉章，註稱：「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通篇稱贊，毫無貶詞。始悟詩以溫厚和平為主，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稍露幾微，便墮村婦罵偷雞口吻矣。

³³

以上作者如郝敬、許學夷、鄧雲霄等人，均推崇《詩經》所強調的「溫柔敦厚」之旨，並以其溫厚和平之風當作後世詩歌的準則。若失卻此溫厚和平之風，不免墮於輕浮狹輸，甚至於村婦罵偷雞口吻，至此斯文掃地，其詩亦不足觀也。為救此詩歌流弊，唯有重視《詩經》的溫柔敦厚之旨，即性情，方能挽狂瀾於逆流之中。由此可見，晚明時期，諸詩話作者，如以上所舉，他們注重性情之說，有其觀察所得，並欲救其弊，沿波討源，溯源至《詩經》的溫柔敦厚之旨，希冀以濟後世詩歌澆薄

³² 鄧雲霄《冷邸小言》，《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484。

³³ 鄧雲霄《冷邸小言》，《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490。

之風。

四、尊序與廢序

自明代中葉起，朱子《詩》說，已開始受到質疑，遭朱子所廢棄的〈詩序〉，也有學者重新評價。如許學夷的主張是不廢朱說為主，援引孔（穎達）說為輔，作一折衷。如許氏云：

〈小序〉、《正義》說詩，漢、唐諸儒無不宗之。其〈國風〉詞如感懷者，為詩人託其言以寄美刺，則既得乎性情之正，且足以見詩人敦厚之風。姜白石謂「美刺箴怨皆無迹」是也。但其他多依附史、傳，牽合時代，味其詞，實多不類。朱子因〈小序〉為辯說，最是有見；然於變風如懷感者，必欲為其人之自作，則當時諸儒亦有不相信者。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旨甚顯，其語甚明。朱子則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是《三百篇》不能無邪，而讀之者乃無邪也，豈孔子之意耶？又云：「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信如此說，是《詩》兼《春秋》之法者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則《詩》與《春秋》，其用不同矣。《詩》不可以兼史，揚用修既嘗辨之，顧可以兼《春秋》乎？朱子乃云：「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今試舉陳、隋妖豔之詩，奏之於初學小子之前，吾恐不足以興，適足以相誘耳。³⁴

許氏認為「〈小序〉、《正義》說詩，漢、唐諸儒無不宗之」，其淵源仍有可信之處，如許氏認為「〈國風〉詞如感懷者，為詩人託其言以寄美刺，則既得乎性情之正，且足以見詩人敦厚之風。」認為〈小序〉之說基本是可信的。但許學夷對

³⁴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183。

朱子不信〈小序〉解詩之說，仍有許多疑慮。第一，〈小序〉依附史傳，詞實多不類，如許氏認為：〈小序〉之中「其他多依附史、傳，牽合時代，味其詞，實多不類」，而朱子解詩之處，如「然於變風如懷感者，必欲為其人之自作，則當時諸儒亦有不相信者。」此為疑慮之一；第二，是思無邪的問題，許氏認為孔子已明言《詩》「思無邪」，而朱子卻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明顯與孔子所言的「思無邪」之旨，大相逕庭，此為疑慮二；第三，《詩》可兼《春秋》之法乎？許氏，認為「《詩》不可以兼史，楊用修既嘗辨之，顧可以兼《春秋》乎？」《詩》與《春秋》，其用不同，此為疑慮三。許氏又說：

朱子云：「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註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個甚事。」此謂說詩當順其文氣之自然耳。予謂〈小序〉依附史、傳，牽合時代，固當以此正其謬妄。若變風如感懷者，必欲順其文氣而為其人之自作，寧不甚害於理耶？且既謂說詩當順文氣，而於孔子「思無邪」、「興於詩」二語，反不當順其文氣而顧強為之說耶？又云：「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豈有將欲刺人，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哉？」予謂：必其詞有賓主之分乃得為刺，則〈東山〉之詩亦當為歸士之自作，而〈小雅〉、〈四牡〉、〈採芣〉亦不得為勞使臣、遣戍役之詩矣。且託其言以寄刺，又曷為陷其身於所刺之中哉！如今人言忠孝淫奔之事，皆述其事，述其言，不必有美刺之詞，而美刺在其中。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其詞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此語尤足省發。³⁵

許氏認為朱子「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是為了順著文氣之自然來說，但仍有其範圍與局限。但許氏也不是完全贊成朱子的說法，而是認同孔子「思無邪」、「興於詩」的見解，而採取〈小序〉的看法。但許氏仍站在一折衷的立場，不宗朱說，也不廢序的立場，而是根據他本身深造自得的想法，作一調和取擇，其言曰：

³⁵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183-3184。

按：《三百篇》古訓，經秦火之後，漢初諸儒說《詩》及傳、記所引韓、魯、齊三家之說，多迂遠不類。惟〈小序〉最後出，而多有可宗，自是三家之說浸微。葉氏曰：「《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或曰：毛公非韓、魯、齊同時耶？曰：《後漢·儒林傳》言衛宏作〈毛詩序〉，朱子以為宏特廣而潤色之，故或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為，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李氏亦曰：「以〈詩序〉考之，文詞般亂，非出一人之手，實出漢之諸儒也。」則〈小序〉參雜諸儒之說明矣。但漢儒迂謬，終不免於牽合。逮於宋儒，歷時益久，講習益精，其說始為安妥。惟朱註以〈國風〉詞如懷感者為其人之自作，則實有難從耳。今一以朱註為定說者，既不得詩之宗旨，其信古者一以〈小序〉為宗，則亦失之迂矣。³⁶

在此處，許學夷認為〈小序〉比齊、魯、韓三家詩晚出，實不然。今人杜其容教授《詩毛詩傳引書考》一書中，認為《毛傳》約成於秦末漢初。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惜許學夷未能深察。³⁷許氏對〈小序〉與朱說的看法，說出他的折衷想法：「但漢儒迂謬，終不免於牽合。逮於宋儒，歷時益久，講習益精，其說始為安妥。惟朱註以〈國風〉詞如懷感者為其人之自作，則實有難從耳。今一以朱註為定說者，既不得詩之宗旨，其信古者一以〈小序〉為宗，則亦失之迂矣。」因此，許氏認為須折衷兩家看法，對《詩經》的註解的擇取，大抵以〈國風〉，孔氏、朱子而參酌之，至於〈雅〉、〈頌〉，則一以朱註為主，其言曰：

朱子說〈國風〉，雖未得美刺之旨，而分章訓釋，簡淨明白，當是古今絕手。孔氏宗〈小序〉，雖美刺有得，而章句離析，冗雜蕪穢，且比、興處往往穿鑿，真境實遠。朱子云：「〈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卻在讀者。」又云：「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澹，只管添

³⁶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196。

³⁷ 參見杜其容《詩毛詩傳引書考》（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油印本，1953年），在此謹感謝匿名評審教授的提點，謹此申謝。

上義理，卻窒塞了他。」故〈國風〉當以孔氏、朱子而參酌之，至於〈雅〉、〈頌〉，則一以朱註為主。³⁸

在此處，許學夷對朱子《詩》說的看法，採取折衷的看法，不廢〈小序〉，亦不廢朱說，旁採孔穎達《正義》之說。

馮復京是歸屬於尊序的，對朱說，則不敢苟同，他說：

朱子不信〈小序〉，其說〈鄭風〉，一概以為男女相悅。然「有女同車」，不謂之刺怨不可。以姜為齊姓，春秋前文字，未有雜施於他姓之女者。毛說有據，他可例推，百代而下，豈容以夢語奪之。³⁹

在此處，馮復京認為〈小序〉，其言有據，並非鑿空之說，其來有自，不宜輕廢。而郝敬對朱說更是大加撻伐，不遺餘力，更是尊序的一大擁護者，他說：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枯索，無復興致可風。⁴⁰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即是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朱子必責詩中語為徵，正與古序相反。苟詩辭已直，又焉用序為？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複語，書序所以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也。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少乎？⁴¹

郝敬認為《詩經》所以高絕千古，正在於其寄興悠遠，而序者遂也，乃在於作者有未達之志，由序來遂達作者未達之志，因此，序不可廢。也正由此來理解詩之志。郝敬再度說明古序與經傳合，並非鑿空妄說：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其學亦可知。毛公根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諒非偶爾。朱子一切詆為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今非。有識者，何敢諛今而

³⁸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86。

³⁹ 馮復京《說詩補遺》，《全明詩話》第五冊，頁 3853。

⁴⁰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5。

⁴¹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6。

背古乎？⁴²

郝敬又認為「古序全體《春秋》之義」，其言曰：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意，寄于言外。當時作詩詳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矣。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于《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略可據。朱欲廢毛，已為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⁴³

郝敬直接認為《詩》是可以兼《春秋》之法的，其意見恰恰與許學夷相左。郝氏認為古序在贊美譏刺方面，僅各舉大略，然而不盡之意，則寄於言外。而當時作詩詳委，具在國史，今已不可考，轉遂以毛公序說不可信，郝敬直呼「予河漢而不信也」。

郝敬更進一步說明，讀《詩經》須本之於古序義理：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為古，而序為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⁴⁴

郝氏認為如果要更瞭解詩旨的話，須本之古序義理，方能周匝完備，因此古序是不可廢的。以下數則引言，則是郝氏反駁朱說之言，謹列於下：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為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即斥為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代，惟以切直為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而其淺率甚矣。何稱為主文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為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⁴⁵

郝氏在此處認為「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為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即斥為鑿空。」若依此原則，郝氏認為可

⁴²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6。

⁴³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6。

⁴⁴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6。

⁴⁵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7。

以校對其他書籍，或考校制度，若以此來言《詩》則不可，因為太過切直、淺率。郝敬又進一步說，朱子詆前人詩說為鑿空，抑不知己說未嘗妄說？其言曰：

朱子詆前人詩說為鑿空，抑不知己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為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為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計四百年，既為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警然自以為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始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誰而不信也。⁴⁶

朱子改古序，祇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⁴⁷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⁴⁸

郝敬在此的理據，大抵以毛公距離《詩經》的年代較近，其說較可信；而朱子的年代距離又遠矣，豈可以年代較久遠的說法來反駁年代較近的說法，所以朱子之說，是不可信也。

《詩三百》，聖人所以鑿在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犁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為附會，依辭泛解，全失刪定之意。⁴⁹

詩不熟《三百》，不知古人溫柔敦厚之義，然不讀古序，何由知《三百》。近世博士，家守朱傳，淺率固陋，溫厚之意斬然。自古詩絕響，末學遂恣其誑謔，安得戶曉之？⁵⁰

郝敬在上文所言，《詩》是可以兼《春秋》之法的，因此，「《詩三百》，聖人所以鑿在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詩》是有《春秋》筆法，其微言大義，正在於古序中。同時，郝敬反對朱子的讀詩法，也是其來有自。其言曰：

⁴⁶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7-2858。

⁴⁷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8。

⁴⁸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58。

⁴⁹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4。

⁵⁰ 郝敬《藝圃倫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88。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為眼前，以深永為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⁵¹

郝氏反對朱子的「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承上所言，郝氏以為《詩》兼有《春秋》筆法，不免深永崎嶇，若一味徒守皮膚眼前，恐難得《詩》深遠之旨。因此，郝敬認為言《詩》關乎氣質：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托興，必認以為真；《詩》多婉言，必改使從直；《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頤者。⁵²

綜合以上所言，明朝以降，說《詩》者，大抵以朱熹為宗，採取廢序的說法。但至晚明的學者對朱熹的《詩》說，也不再全然接受，如許學夷採取折衷的看法，採朱說為主，孔疏為輔的作法，如馮復京、郝敬對朱說則是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對《詩序》則採取尊崇的態度。雖說其辯駁的主張，也不全然是正確的，但也反映出朱說在晚明時期的式微。

五、對賦、比、興的不同見解

晚明時期的詩話著作，對賦、比、興提出不同的見解，是這一時期詩話著作的精彩之處。雖說不盡然合於賦、比、興的原義，但也是作者深造有思而自得之言，亦不可全然否定。其中，如郝敬認為，《詩經》的「六義」，不是傳統所說的，風、雅、頌是詩體，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方法，而是六者相互而生詩的，不可隨義分裂，說明「六義」是一個整體的。他說：

⁵¹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1。

⁵²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3。

《詩》有六藝：風、雅、頌，析為三經；而賦、比、興，非判為三緯也。經始於風，變而為雅，再變而為頌。頌去風浸遠，然無風不可以為詩，雖雅頌亦風也。緯始於賦，中於比，終於興。興者，詩之情，詩盡乎興矣。故六義以風始，以興終。明乎風與興而詩幾矣。《易》曰：「巽為風」。詩者，巽言也。風入為聲，風行而聲達，造化所以鼓舞群動也，故曰興於詩。聞風興起，則異世同神，故風首三經。二〈南〉，文王所以興起百世也。賦比無興，不可以為賦比；雅頌無風，不可以為雅頌。今謂某詩為賦為比，某詩為興，謬也。雖風豈無雅，二〈南〉與〈豳〉風，亦雅也。頌豈無風，〈魯頌〉亦風也，而三緯可推矣。⁵³

六義不越情、事、辭三者而已。感動為情，即景為事，敷陳為辭。興因情發，比觸景生，賦以辭成。風主情，雅主事，頌主辭。情有悲歡，故風多感動。境為實事，故雅多獻替。辭本聲音，故頌用登歌。經緯變合，六義互而生詩。漢魏以來，六義不明，以興為托物，以比為借喻，以賦為直陳，各不相屬，六義分裂，何可言詩？⁵⁴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於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為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綜括曰賦，意象符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⁵⁵

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若裁為三體，豈成義理？⁵⁶

比者，寓托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為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托言于彼，皆是比。……故凡托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為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言哉！⁵⁷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

⁵³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77-2878。

⁵⁴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78-2879。

⁵⁵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1。

⁵⁶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2。

⁵⁷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2-2863。

朱元晦所以誤比為興，其疏謬從來遠矣。⁵⁸

郝敬認為六義不越情、事、辭三者，事、辭均是由情所發，由情來主導。他是由文學作品的本質上來思考，認為「六義」是不宜分割的，但此種意見是否同於「六義」的原義，則另當別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亦不失為以文學的視角來看待「六義」。

其次，方以智的《通雅詩話》對賦比興的見解，亦有特殊的見解。他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反復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世亦有知比者，未可以言興也，興之為比深矣，賦之為比興更深矣。⁵⁹

他認為興之為比深矣，賦之為比興更深矣，似有違常識之論。賦為平鋪直敘，似與比興較為容易，但簡易之中方見工夫，絢爛造於平淡，就作詩而言，平淡之中方見手段，不失為有見之言。亦可見方以智詩學不離唐音，漸染宋調之風。

再次，尚有費經虞、馮復京對賦比興的看法。如費經虞說：

費氏曰：「風雅包羅廣博，非可一端求一格定也。三代之詩，微言動物謂之風，故比興多而賦少；直陳時事謂之雅；一意稱禱謂之頌，故賦多而比興少。〈風〉之體微而婉，〈雅〉之體正而莊，〈頌〉之體簡而重，此其大略也。」

60

馮復京說：

詩有賦比興三義。賦者，布也。興者，感也。布義感懷，情理一揆。比者，喻也。托物見志，深淺殊趣。故四言之比深微悠遠，五七言之比，指切顯明。漢詩「新裂齊紈素」，一篇之比也。「枯桑知天風」，二句之比也。入唐，則賦興多而比少，如宋人之解杜詩，穿鑿附會，狂噬不休，詩道之蠹賊矣。

61

另外，許學夷與謝肇淛二者均將賦、比、興中的興，推為首義，不同於郝敬與方以智之說。由此可見，晚明時期詩話著作對賦、比、興的多樣多端的不同見解。

⁵⁸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3。

⁵⁹ 方以智《通雅詩話》，《全明詩話》第六冊，頁 5096。

⁶⁰ 費經虞《雅倫》，《全明詩話》第六冊，頁 4846。

⁶¹ 馮復京《說詩補遺》，《全明詩話》第五冊，頁 3845。

如許學夷說：

後世詩不離情、境、辭三者，即所謂興、比、賦也。太上寄情，漢魏〈十九首〉是也。其次寫境，六朝諸人之作是也。其次尚辭，唐以後近體是也。⁶²

風人之詩，不特性情聲氣為萬古詩人之經，而托物興寄，體製玲瓏，實為漢、魏五言之則。至其分章變法，種種不一，而文采備美，一皆本乎天成。大都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華藻自然，不假雕飾。退之謂「《詩》正而葩」，蓋托物引興，則葩藻自生，非用意為之也。⁶³

謝肇淛說：

故《詩》有六義，興居其首。四始之音，風為之冠。誠能深於物感之旨，遠追風人之致，翛然寄興，由形入神，其於詩道，無餘蘊矣。⁶⁴

詩以興為首義，故作詩何常？惟要情境皆合，神骨俱清。⁶⁵

姑不論上述各家對賦、比、興的不同見解是否全合於原意，但觀諸家之言，皆深造有思之言，不可一概否定。政可證諸晚明詩話著作對賦、比、興的多樣歧端的見解，譬諸醫病，或療虛以培元，或攻毒以卻疾，萬應殊方，因疾入手，下藥對症，皆深造有思而自得之言，不宜扣執一端而論斷。從此處亦可見出晚明詩話著作的精彩處。

六、朱熹讀書、讀詩法的繼承

雖說朱熹的《詩》說在晚明時期不再擁有主導的地位，但其讀書法、讀詩法的繼承，則代有其人，如費經虞與許學夷二人。

如費經虞引朱熹的讀書、讀詩法特別多，其言曰：

⁶² 郝敬《藝圃僉談》，《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88。

⁶³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79。

⁶⁴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501。

⁶⁵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504。

朱元晦云：「讀詩須沉潛，諷詠義理，咀嚼滋味，方有進益。須將詩來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又吟詠三四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是處。詩全在諷詠之功，看詩不必著意裏面分解，但憑涵咏自好。」⁶⁶

陳文蔚《說詩》：「朱元晦云：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祇是不見那好處。如昔人賦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不曉得？前輩直恁地稱說他形容得好是何如，這個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須是看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個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是一重。」⁶⁷

朱元晦云：「溯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暈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其如未然，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透不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⁶⁸

另外，許學夷亦說：

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世之習舉業者牽於義理，狃於穿鑿，於風人性情聲氣了不可見，而詩之真趣泯矣。正風如〈關雎〉、〈葛覃〉、〈卷耳〉、〈汝墳〉、〈草蟲〉、〈殷其雷〉、〈小星〉、〈何彼穠矣〉等篇，自不必言；變風如〈柏舟〉、〈綠衣〉、〈燕燕〉、〈擊鼓〉、〈凱風〉、〈谷風〉、〈式微〉、〈旄丘〉、〈泉水〉、〈氓〉、〈竹竿〉、〈伯兮〉、〈君子于役〉、〈葛生〉、〈蒹葭〉、〈九罭〉等篇，亦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學者苟能心氣和平，熟讀涵泳，未有不惻然而感，惕然而動者。於此而終無所得，則是真識迷謬，性靈枯亡，而於後世之詩，亦無從悟入矣。⁶⁹

如此段，許氏並不明言是受朱熹讀書法的影響，但觀其「熟讀涵泳」之句，亦可知深受朱熹的影響。

⁶⁶ 費經虞《雅倫》，《全明詩話》第六冊，頁4804。

⁶⁷ 費經虞《雅倫》，《全明詩話》第六冊，頁4804。

⁶⁸ 費經虞《雅倫》，《全明詩話》第六冊，頁4829。

⁶⁹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3179。

雖說朱熹的讀書、讀詩法的影響代有其人，但還是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如郝敬一向反對朱熹的看法，在此也不例外。如郝敬說：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為眼前，以深永為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⁷⁰

七、古音古韻的問題

對《詩經》古音古韻的問題，早在明代中期，楊慎已揚其波，其後焦竑振其響，認為古來所通行的叶音說，實不可信。陳第著有《毛詩古音考》、《讀詩拙言》等著作，認為古今音不同，曾將《詩經》的押韻現象，略加歸納，證明《詩經》所押的韻是古音，證明叶音之說，實不可信。⁷¹

但在晚明時期的詩話作者，如後於陳第的許學夷與郝敬也不全然同意於陳第的古音說。如許學夷說：

古今風氣不同，其音韻亦自應不同。然《三百篇》、《楚辭》及經傳韻語，或用古音，或用方音，或字有訛誤，故讀之多有不諧，後人不得不協。趙凡夫謂：「古詩歌音韻不諧者，皆是古音。宋人失讀，謬作協韻，乃遍搜古詩歌及經傳韻語不諧者，定為古音，以教後學。」予謂：苟如此，則混亂極矣！蓋古詩古音，理宜有之，然實無所考據，故不得不協之，以合今韻。今乃并其方音訛字而定為古音，謬愈甚矣！且古韻實寬，故凡音韻稍近者，皆不必協，協之恐反失真耳。惟平、仄不諧，上、去不合者，協之可也。至有必不

⁷⁰ 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2861。

⁷¹ 以上參閱林慶彰著，《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頁116-117。

可協者，姑闕之。⁷²

如郝敬亦採叶音之說⁷³，照理而言，陳第的古音說一出，叶音說應不攻自破。但實際上，卻不然。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而言，學術的發展是有漸無頓。誠就典範的轉移的角度來看，所謂典範轉移，原出自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中心概念。此書從科學史的視角探討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的本質，第一次提出了「典範」（paradigm）理論以及不可通約性、學術共同體、常態、危機等概念，提出了「革命是世界觀的轉變」的觀點，深刻揭示了科學革命的結構，開創了科學哲學的新時期。但此書的影響力，不僅在科學哲學方面，同時也在社會人文領域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庫恩解釋典範在科學革命中的作用：科學革命在這裡是指科學發展中的非累積性事件，其中舊範式全部或部分地為一個與其完全不能並立的嶄新範式所取代。⁷⁴由此可見，雖說陳第的古音說已提出，但相對相關的例證並未陸續地提出，因此，許學夷與郝敬仍處在新舊典範之間，如許氏已注意的到古音古韻的相關問題，但他也不敢大膽採取新的典範，採取古音說，但其中新舊典範的過渡消息，亦可探知一二。而晚明時期的詩話著作對古音古韻的新舊典範轉換的過渡期的訊息，亦可作學術探討的旁證。

八、結語

本文的結論，大約可歸納為下列四點：一、對明代《詩經》學作必要的補充，如對《詩經》的文學史的地位與價值與《詩經》注重性情的闡發；二、明代詩話中，對朱熹《詩經》學的繼承與揚棄，朱子廢序說重新評價與其讀書、讀詩法的影響；三、對晚明文人對「賦比興」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及其孤鳴獨發、深造自得的想法，

⁷² 許學夷《詩源辯體》，《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3196-3197。

⁷³ 可參見郝敬《讀詩》，《全明詩話》第四冊，頁 2869-2872。

⁷⁴ [美]托馬斯·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4刷），頁 85。

有一全面的瞭解，也可見晚明時期詩話著作的精彩處；四、可補充明代《詩經》學過渡到清代《詩經》學中，古音古韻環節。另外，《詩經》中的淫詩問題與名物制度考證的問題，晚明詩話著作亦談論不少，以俟來日加以論說，茲不討論。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 1、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一至六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6月1版1刷。
- 2、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冊三，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3、《明史》冊四，臺北：藝文印書館，清乾隆武英殿影本。
- 4、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2月臺四版。
- 5、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2刷。
- 6、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1月1版。
- 7、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9月初版。
- 8、陳國球編，《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5月初版。
- 9、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1版9月2刷。
- 10、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1版1刷。
- 11、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7月初版。
- 12、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1版1刷。
- 13、廖可彬，《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下冊），1994年2月初版。
- 14、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4年2月初版。

- 15、鄧新華，《中國古代接受詩學》，武漢：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1刷。
- 16、朱萬曙、徐道彬編，《明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研究》，2005年7月1版1刷。
- 17、孫立，《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學》，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1刷。
- 18、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1版1刷。
- 19、徐中玉、郭豫適主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十九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1版1刷。
- 20、徐中玉、郭豫適主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1版1刷。
- 21、徐中玉、郭豫適主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1刷。
- 22、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1月1版1刷。
- 23、中國詩經學會、河北師範大學編，《詩經研究叢刊》（第十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1刷。
- 24、鄒其昌，《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1版1刷。
- 25、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2002年1月初版1刷。
- 26、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3月初版。
- 27、向熹，《《詩經》語文論集》，成都：四川民族，2002年7月1版1刷。
- 28、林慶彰編著，《詩經研究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11月初版。
- 29、朱杰人主編，《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1版1刷。
- 30、吳雁南、秦學頌、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 31、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
- 32、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3月修定1版2刷。

- 33、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年6月。
- 34、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冊），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
- 35、潘立勇，《朱子理學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1刷。
- 36、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下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3年5月出版。
- 37、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年10月初版。
- 38、〔美〕托馬斯·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4刷。
- 39、杜其容著，《詩毛氏傳引書考》，臺北：臺大圖書館藏，油印本，1953年。

（二）學位論文

- 1、楊晉龍，《明代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6月。
- 2、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 3、蕭開元，《晚明學者的《詩序》觀》，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4、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三）期刊論文

- 1、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一九四九～一九九八〉，《漢學研究通訊》，總79期，2001年8月。
- 2、楊晉龍，〈明代學者〈秦風·蒹葭〉詮釋析論——明代詩經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探討〉，《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5期，2008年9月。

- 3、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6 期，2000 年 3 月。
- 4、陳文采，〈鍾惺《評點詩經》析論〉，《臺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期，1998 年 6 月。
- 5、游適宏，〈就「詩」論《詩》：晚明《詩經》評點的興起及其性質〉，《道南文學》第 12 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1993 年 12 月。
- 6、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性質析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 7 期，2002 年 6 月。